

杜波伊斯的知识本土化经验^{*}

——评《被抹杀的学者》及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思考

李 代

提 要：《被抹杀的学者》试图证明，黑人学者杜波伊斯在 19 世纪末开创的亚特兰大学派是美国第一个“科学的”社会学派。该书为社会学史著作，关注的议题归属知识社会学关于知识生产制度化的研究脉络。本文分析了该书的论述结构，并指出其不足之处，力图评价杜波伊斯本身及其历史际遇各自的研究价值。本文认为，杜波伊斯坚持研究议题的本土化和研究方法的普适性，反思其经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并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关键词：杜波伊斯 社会学史 芝加哥学派 本土化

谁是美国最早注重社会调查与经验研究的社会学派？大家通常会回答：芝加哥学派。然而这一“常识”遭到了有力的挑战。美国社会学者阿尔顿·莫里斯（Alton D. Morris）在《被抹杀的学者——杜波伊斯与现代社会学的诞生》一书中提出，美国第一个“科学的”社会学派是黑人学者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① 在 1897 年加入亚特兰大大学后创建的。他认为，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不但活跃的时间晚于亚特兰大学派，而且不论是方法论还是关于黑人社区的经验研究都没有超越杜波伊斯，因而不应被看作美国第一个注重社会调查的社会学派。

莫里斯的观点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如果接受他的论断，不但教科书需要改写，更需重新审视美国社会学发展的早期历史。莫里斯认为杜波伊斯之所以没有获得应有的承认，是因为他是提倡民权的黑人学者，非学术性的外在因素影响到了美国社会学塑造的英雄谱系和研究脉络。在知识社会学的意义上，这反映了知识生产体制

^{*} 感谢周飞舟、焦长权以及两位评审人对本文写作提出的宝贵建议，以及阿尔顿·莫里斯和迈克尔·施瓦茨对一些相关专业问题的解答和建议。感谢海瑞萨·拉莫兹启发作者写作本文。

^① 杜波伊斯系海地移民后裔，姓氏按法语发音应译作“杜布瓦”。本文尊重文献传统译法，仍译作“杜波伊斯”。

化过程中的问题。

除了知识社会学的贡献外，该书讲述的杜波伊斯案例也可以激发我们对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进一步思考。杜波伊斯自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学返美，研究取向与其同时的美国同行迥异：即用科学方法、实地调查研究美国黑人问题。其议题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和现实关怀，方法则具备一定条件下的普适性，这与数十年后美国社会学的主流不谋而合。与其说是杜波伊斯融入了主流，不如说是主流融入了杜波伊斯。由此来看，本土化的社会学研究亦有可能取得超越时空的成果。中国社会学如何创造长远的学术价值、取得广泛的学术影响，这是我们需要着力思考的问题。

目前，中国社会学对杜波伊斯研究较少。与研究之稀薄相映成趣的是，杜波伊斯与新中国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他于1959年、1962年两次访华，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高级领导人的接见，部分著作也翻译成中文。遗憾的是那时中国社会学尚未重建，他与中国的缘分没有转化成与中国社会学的缘分。与之相对，帕克在20世纪30年代来华讲学，吴文藻、费孝通等受其影响。这段轶事恰好也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中的一段曲折，引人深思。本文从《被抹杀的学者》入手，探讨其引出的若干问题：今人研究杜波伊斯还有没有意义？对中国社会学而言研究杜波伊斯的价值何在？本文的目的并非说服读者接受莫里斯的论点，而是希望以此为契机，引发学界对杜波伊斯研究的兴趣。这既包括对杜波伊斯本身理论贡献的兴趣，也包括对美国早期社会学史的兴趣。

一、杜波伊斯的早期学术生涯

莫里斯力图证明，黑人学者杜波伊斯在19世纪末开创的亚特兰大学派是美国第一个“科学的”社会学派，而其之所以史上无名，是因为他遭到以帕克为代表的白人学者的排挤。为此，莫里斯需要梳理杜波伊斯的学术生涯和贡献，来论证杜波伊斯采用了科学方法进行社会学研究，并且其时间比芝加哥学派更早。

杜波伊斯于1868年出生，1888年、1890年先后在菲斯克大学（Fisk University）和哈佛大学取得学士学位。1895年，他在哈佛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个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的黑人。1892—1894年间，他赴德国柏林的腓特烈·威廉大学（Friedrich Wilhelm University in Berlin，现更名为洪堡大学）学习国民经济学，受施穆勒影响。基于

在德国学习的经历，杜波伊斯立志以社会学为业，用科学方法研究美国黑人问题。189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雇佣他对费城黑人社区进行调查研究，基于该调查形成了1899年出版的《费城黑人》(Du Bois, 1899)。1897年，杜波伊斯加入了面向黑人招生的亚特兰大大学，该校的社会学系为美国最早建立的社会学系之一。^①杜波伊斯持续不断地开展、发表基于实地调查的社会学研究，并培养了大批黑人社会学者。1910年，杜波伊斯离开亚特兰大大学，与伙伴共创“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担任协会刊物《危机》(Crisis)的主编。

以今人之眼光来看，杜波伊斯的研究方法尚有不成熟之处。但回到19世纪末的历史语境，他带领合作者深入社区进行访谈、观察、收集数据，使用统计方法，科学性比较明显，未必逊色于其后芝加哥学派的工作。杜波伊斯认为，要想让自己的研究不被白人轻易否决，只能依靠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科学方法。他讥讽不认真做调查的学者是“车窗社会学家”，只开车经过黑人社区走马观花而不下车探访。莫里斯认为(Morris, 2015: 21—29)，杜波伊斯重视经验研究、统计方法，与呼唤中层理论的罗伯特·默顿颇有相通之处，但比后者早了半个世纪；有学者认为梅奥—史密斯(Mayo-Smith)和吉丁斯(Giddings)将统计方法引入社会学，但杜波伊斯比这更早(Camic & Xie, 1994)。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杜波伊斯从事社会调查早于芝加哥学派。罗伯特·帕克于1914年来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担任讲师、开展社会调查，被美国社会学看成美国种族研究之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芝加哥培养的黑人学生被当成美国第一代黑人社会学家。1918—1920年出版的五卷本《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Thomas & Znaniecki, 1984)往往被奉为社会调查的经典之作，但它晚于1899年的《费城黑人》(Morris, 2015: 68)。总之，莫里斯认为芝加哥学派所开展的具有科学性的社会调查比杜波伊斯晚了近20年，因而亚特兰大学派更应被称作美国最早的“科学的”社会学派。

二、杜波伊斯遭到排挤的原因

接下来，莫里斯要处理主观动机的问题，因而更加棘手：他意图说服读者帕克

①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于1892年建系，但并没有从一开始就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进行研究。

出于种族主义排挤了杜波伊斯。社会学奠基于欧美的殖民时代、工业时代，正典大多由中产阶级的白人男性写就（Connell，2013），与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Kurasawa，2013）。这一特定群体对现代社会的认识被塑造成了普适性的知识（Go，2016a）。揭示这一体系中潜在的政治偏见，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脉络。

帕克是否出于种族主义排挤杜波伊斯？这一问题可分解成五个子问题。第一，帕克是否有客观上排挤杜波伊斯的行为？第二，如果有的话，这是否是因为帕克不了解杜波伊斯的研究，因而是无心之失？第三，这是否是因为杜波伊斯的研究水准不高，因而帕克并未有失公正？第四，帕克是不是种族主义者？第五，帕克对待杜波伊斯是否受种族主义影响？下面我们梳理莫里斯对于每一点进行的论述。

帕克是否客观上排挤了杜波伊斯？帕克加入芝加哥大学之时杜波伊斯已经离开亚特兰大大学，把杜波伊斯在大学工作时遭到的待遇归于帕克显然不合适。但是帕克后来成为美国社会学公认的种族研究专家，是美国社会学英雄谱系的关键书写者。他对杜波伊斯避而不谈，削弱了杜波伊斯的学术影响。帕克与伯吉斯（Park & Burgess，1921）共同编纂的教科书《社会学入门》于1921年出版。这本教材塑造了之后20年美国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的认识，而其中并无杜波伊斯。帕克的社会学论文即使是关于黑人的研究也极少引用杜波伊斯，而在少数引用的例子中也称其为“先生”，而不是学科或专业上的称谓（Morris，2015：139）。在莫里斯看来，帕克在写作论文或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对杜波伊斯避而不谈、削弱了其在学术脉络中应有的影响。

帕克是否了解杜波伊斯的研究？如果帕克并不了解杜波伊斯的著作，那么对其着墨不多可能是无心之失。实际上，帕克在来到芝加哥大学之前就非常熟悉杜波伊斯的工作。在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前，帕克为黑人领袖布克·T·华盛顿工作，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攻击杜波伊斯。1905年，帕克受华盛顿之邀来到阿拉巴马州塔斯克基学院担任公关主管，工作内容之一是代其写作书稿、文章。华盛顿与杜波伊斯在黑人问题上的立场迥异，风头正盛的华盛顿大肆打压杜波伊斯，其中也包括在报刊上抹黑、攻击对手，莫里斯认为这正是帕克的一部分工作（Morris，2015：106）。如果说帕克对杜波伊斯一无所知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莫里斯举出的另一个例子是杜波伊斯的“双重意识”与帕克“边缘人”概念的关联（Morris，2015：145—147）。杜波伊斯指出，黑人具备“双重意识”：“这种双重意识，这种要不断通过他者的眼睛审视自身、用一个带着被逗乐的轻蔑与怜悯观

看他的世界的软尺衡量自己灵魂的感觉是奇异的。他一直能感受到自己的二重性，是美国人，同时也是黑人；两个灵魂、两个思想、两段无从和解的斗争；同一个黑色身躯里包含两个交战的理念，只是靠了自己顽强的力量才没被撕成两半。”（Du Bois, 1903: 2—3）这与帕克的“边缘人”概念颇为相似：“他同时生活在两种文化生活和传统之中。他既不愿脱离原本的传统，又因种族歧视而无法真正被新的社会接受。他身处两种文化、两个社会的边缘，这两者永远都不能完全融合。”（Park, 1928: 892）这里帕克并没有提及杜波伊斯，但古德伯格（Goldberg, 2012）发现，1923年帕克就引用过杜波伊斯的“双重意识”（Park, 1950）。杜波伊斯的“双重意识”早于帕克，帕克了解其学术观点却不承认自己受其学术影响。

杜波伊斯的研究是否有较大的学术价值？评判学术研究的价值离不开主观性，为了提供一个权威的参照系，莫里斯“请出”了韦伯。1904年，韦伯在访美期间与杜波伊斯有了学术交流，并发现其关于黑人问题的研究对自己关于波兰人问题的研究有极大启发。韦伯写信邀请杜波伊斯给自己的期刊《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撰文，介绍其研究成果。韦伯在信中表示，当时德国与美国的研究总把种族关系归结到生物学因素上，算不上社会科学，因此毫无用处（Scaff, 2011: 257）。相反，杜波伊斯并不认为黑人先天低劣于白人，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黑人地位的社会历史成因，这符合韦伯的研究取向。韦伯还提议将杜波伊斯的《黑人的灵魂》翻译成德文出版，尽管最终未能成功。韦伯对杜波伊斯有高度评价，其在1910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坦言：“我想说在美国南部最重要的社会学者是一个黑人——杜波伊斯，没有一个白人学者可相比拟”（Weber, 1973: 312）。韦伯对杜波伊斯的背书肯定了其学理价值。

帕克是不是种族主义者？莫里斯引用帕克的若干言论来说明。帕克说：“难以想象任何其他两个种族在秉性（生物的）与传统上的差异比盎格鲁—撒克逊和黑人这两个种族之间更大。”（Park, 1950: 209）帕克与韦伯至少在下面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左。帕克认为不同种族的生物特质导致其气味不同，而种族歧视可能正是人对异族气味的一种自发、自保的反应（Park & Burgess, 1921: 623）。韦伯则声称，他的鼻子可以作证，黑人并没有什么白人无法忍受的气味，这不过是美国人为了排挤黑人而发明的说辞（Weber, 1971: 37）。

帕克是否出于种族主义动机而排挤杜波伊斯？莫里斯试图从帕克与杜波伊斯在种族问题上针锋相对的看法，来证实这一推断。杜波伊斯认为，黑人与白人是平等

的，并没有科学证据证明黑人天然地低劣于白人。因此，他认为应通过抗争改善黑人的不平等地位，积极投入到黑人解放运动当中。与此意见相左的是，在华盛顿看来，白人更加优越。^①黑人应该首先接受产业教育、从事体力劳动，进而逐步获得经济独立、得到白人认可。博雅教育或高雅文化对黑人没有用处，黑人也不应试图通过政治运动寻求平等，保持种族隔离亦无不可。直至1915年去世为止，华盛顿一直是美国最受主流社会认可的黑人领袖。而帕克从不讳言自己在黑人问题上深受华盛顿影响。在他前往塔斯克基学院为华盛顿工作之前，他对黑人社区并不了解，也正是靠着华盛顿他才能进入美国南方农村的黑人社区。他来到芝加哥任教的契机也与其种族问题上的立场有关系。1912年，帕克在塔斯克基学院组织了一场“国际黑人会议”，主题为“给原始人的教育”。芝加哥大学的W·I·托马斯受华盛顿邀请参加会议并发表演讲，帕克则就会议主题发表主旨演讲。在托马斯和华盛顿的支持下，帕克于1914年来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并逐渐成为芝加哥学派的中流砥柱。

由此，莫里斯认为帕克与华盛顿建立了一个保守主义同盟，二人合作对杜波伊斯口诛笔伐。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在1906年亚特兰大发生种族动乱、白人杀死大量黑人后，杜波伊斯赶紧从田野赶回亚特兰大保护家人，而帕克却宣称他躲在乡下（Morris, 2015: 106）。离开华盛顿后，帕克仍不改其政治倾向。对于他们而言，杜波伊斯要通过社会运动解放黑人过于偏激。帕克或许对杜波伊斯本人并没有恶语相向，但两人对黑人群体的认识天差地别。

综上，莫里斯一步一步地论证，帕克在了解杜波伊斯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前提下，仍然选择避而不谈，导致其在社会学史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三、争议与疑问

莫里斯的观点颇有挑战性，难免引起争议。有学者表示自己被他说服（Muller,

① 华盛顿1856年生而为奴，9岁获得自由。他1881年来到阿拉巴马创立塔斯克基学院。1932年起，美国公共卫生局与塔斯克基学院合作招募约600名黑人，观察梅毒在不加治疗的情况下如何发展。他们未向研究对象告知病情并获取知情同意。1940年代，盘尼西林被广泛用于梅毒的治疗，该研究却并未向参与的病人提供治疗方案。该实验直到1973年才因媒体曝光而被迫终止，这时已有大量参加者因梅毒死亡或致残，甚至将其传染给子女。塔斯克基实验表现出对（黑人）生命的蔑视，成为社会科学伦理课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之一。

2015; Jones, 2015; Go, 2016b; Hunter, 2017; Lentin, 2017), 但也有学者对其展开批评。例如, 卡尔森 (Carson, 2016) 认为帕克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时间在杜波伊斯离开亚特兰大大学之后, 这削弱了莫里斯的论证。对此, 莫里斯表示, 帕克为华盛顿工作时就对杜波伊斯非常了解, 而且杜波伊斯离开亚特兰大大学不等于中止学术生涯, 他之后仍不断从事、发表研究 (Morris, 2016), 帕克没有理由视而不见。

另一猛烈的攻击来自布尔默 (Bulmer, 2017), 他认为莫里斯聚焦于帕克担任华盛顿秘书的阶段是选择性地呈现历史, 是对帕克的人格攻击。他认为帕克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种族主义, 也没有和华盛顿结盟。此外, 他虽然同意杜波伊斯的研究确实遭遇了不公的待遇, 但这对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因为杜波伊斯在 1910 年时就离开大学, 不像帕克一样培养了不少黑人学生。莫里斯 (Morris, 2017) 对此一一进行了回应, 指出: 帕克确实视黑人为下等种族; 帕克自己承认其学术思想深受华盛顿影响, 因此学术研究与其一脉相承; 没有证据表明帕克试图帮助过自己的黑人学生在白人大学谋职, 而他最有名的黑人学生弗雷泽也承认, 自己是在杜波伊斯和亚特兰大学派奠定的研究传统中继续工作。

除此以外, 还有一些疑问未被解答。首先, 杜波伊斯的黑人身份是否影响到他研究黑人问题的客观性? 莫里斯也是黑人学者, 他为杜波伊斯摇旗呐喊, 是不是也受身份立场的影响? 这恰好折射出身份政治影响下少数族裔面临的困境。例如, 杜波伊斯毕生的心愿之一是编纂一本关于美国黑人的百科全书。当该项目终于启动时杜波伊斯四处奔走, 重任却交给了缪达尔这位此前对美国黑人问题了解不多的瑞典经济学家, 由此出版了对美国种族政策和研究有深远影响的《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Myrdal, 1944)。杜波伊斯被冷落一旁的理由是他长期致力于黑人解放运动, 被认为不能保持客观 (Morris, 2015: 198)。难道黑人学者只有生产批评黑人的研究才可信吗? 这样少数族裔研究者先天就陷入无法自证的偏见中。恐怕, 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杜波伊斯有关黑人的观点不符合那个年代美国社会主流的标准。

其次, 帕克对杜波伊斯的排挤是否出于其他与种族主义无关的因素? 韦伯对杜波伊斯赞赏有加, 而帕克编纂的教科书里既没有杜波伊斯也没有韦伯。也许是由于杜波伊斯和韦伯共享的关于社会学的理念不为帕克所认同, 所以他抵制了杜波伊斯? 在这一点上, 莫里斯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又或许是由于其他政治原因让帕克等学者排斥杜波伊斯? 杜波伊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颇感兴趣, 1961 年还加入

了美国共产党。不过帕克在 1905 年开始为华盛顿工作时就已经与杜波伊斯针锋相对，杜波伊斯受苏联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影响广为人知的时间段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Wienen & Kraft, 2007），而来自帕克的排挤早于这个时间。莫里斯完全没有触及杜波伊斯的意识形态倾向、处理杜波伊斯身上复杂的阶级政治与种族政治的关系，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在这一问题上或可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Rabaka, 2020, 2021）。

最后，帕克排斥杜波伊斯，是不是由于他主张超然地研究社会问题、而杜波伊斯恰恰是他反感的社会运动领袖呢？^① 帕克认为社会学家应像研究马铃薯甲虫的科学家一样镇静、超脱地研究社会现象（Matthews, 1977），而杜波伊斯却迫切希望通过学术研究帮助解决美国黑人问题。如果杜波伊斯只是在书斋著书立说、不参与社会运动，帕克是不是就会接纳其研究了呢？这个问题一时难有答案。

四、《被抹杀的学者》之价值

《被抹杀的学者》为杜波伊斯“平反”在今天有何意义？该书首先要处理的是一个社会学史的问题。即便杜波伊斯的研究本身已经“过时”，处理这一历史问题仍有意义。在知识社会学的脉络中，作者把罗伯特·默顿、乔纳森·科尔、史蒂芬·科尔、兰道尔·柯林斯和皮埃尔·布迪厄等学者作为其对话的对象，探讨在社会学知识生产的过程中，种族身份、政治倾向等非智识因素是否会影响学术共同体对“英雄”“正典”的塑造，并对学术脉络的方向和学科建设的结构都产生影响。与这一消极影响相应，作者提出，受压迫的黑人群体受杜波伊斯感召、愿意在物质资源紧缺的条件下追随他的学术事业，反映了其学术工作具备一种“解放性资本”。这给知识社会学带来新的理论洞察。

那么，杜波伊斯本人的著作是否还有阅读、研究的价值？布洛维（Burawoy, 2021）认为，杜波伊斯和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社会学大家一样，仍有理论研究的价值。将杜波伊斯与这三位大家并置、对话，不但可以为学者提供新的研究议题，也可以让学者在研究这三位大家经典时获得新的视角。

^① 与此相映，帕克的太太恰好是一个热心妇女权益的社会活动家（Deegan, 2006）。

莫里斯 (Morris, 2022) 则认为, 重读杜波伊斯有助于现代社会学家更好地理解社会事实。自三大家以降, 由欧美白人男性写就的社会学“正典”把殖民主义、种族问题置于社会学研究的边缘地位, 导致这些研究不能很好地解释美国乃至世界上出现的很多社会现象。例如, 由于忽视黑人的主观能动性, 美国社会学完全没有预见到民权运动的兴起。在这个意义上, 重读杜波伊斯可以帮助我们反省经典社会学脉络中可能存在的偏误, 获得理解社会事实的新视角。像研究马铃薯甲虫一样研究社会并不像它表现的那么科学, 它可能会导致研究者忽视或轻视研究对象的能动性, 陷入彻底的保守主义, 难以把握研究对象动态的变化。拒绝投入情感能否深入理解人类的精神世界、进而研究其社会行动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与帕克相反, 杜波伊斯的情感涉入帮助他更好地理解美国黑人。对杜波伊斯的追思, 反映出部分欧美学者对社会科学研究中僵化、机械的成分保持反思。关于“将心比心”, 周飞舟 (2021) 有深刻的分析, 这揭示出当代中美社会学者的一种共通的方法论诉求。

五、由“杜波伊斯经验”引发的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思考

杜波伊斯与新中国渊源尤深。1959年, 杜波伊斯携夫人初次访问新中国, 得到周恩来、毛泽东、宋庆龄的接见。他在北京度过了自己的91岁生日, 北京大学师生为其祝寿, 郭沫若发表贺辞 (侯波, 1959; 郑小箴, 1959a, 1959b, 1959c)。1962年, 他与夫人再次访华, 在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成立13周年庆典的观礼活动, 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新华社, 1962a, 1962b)。他去世后, 遗孀旅居北京, 1977年在北京去世, 丧礼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 (Gao, 2013)。

在杜波伊斯访华前后, 中国社会学尚未重建, 因而杜波伊斯并未对中国社会学产生直接的影响。相反, 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与芝加哥学派关系密切。帕克早在1932—1933年就受邀来北平燕京大学讲学, 吴文藻深受影响, 费孝通是其班上的学生。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社会学得以重建, 此时在欧美社会学的英雄谱系中已不见杜波伊斯的踪影。

而在社会学之外, 其他学科关注到杜波伊斯的多方面成就。例如, 张聚国 (1999)、王卓和王恩铭 (2018) 探讨了杜波伊斯在黑人是否应该融入美国社会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张聚国 (2000a)、崔波 (2013) 比较了华盛顿和杜波伊斯的差别,

张聚国(2000b)介绍了杜波伊斯在解放黑人斗争策略上的变化。张静静和谭惠娟(2014)梳理了杜波伊斯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观。1993年,我国还成立了中国杜波伊斯研究中心(舒璋,1994)。

杜波伊斯的研究取向与其同时代的美国社会学家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他美国社会学家仍试图以物理学为榜样,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规律,而杜波伊斯聚焦美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把美国黑人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美国黑人问题有其独特的历史成因,自然是深具美国本土化特征的议题。但与此同时,杜波伊斯并不认为其研究仅对美国社会才有价值,而是提出“20世纪的问题正是肤色的界线”(Du Bois, 1903: I)。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之“本土化”与“国际化”并不矛盾,对特定社会现象的精深研究很有可能对其他社会亦颇有借鉴价值。在这种“以我为主”的研究中“国际化”是结果,与把“国际化”作为目的而刻意迎合取舍的研究存在本质区别。

除了议题选择的本土化之外,杜波伊斯强调研究方法之普适性。他重视社会调查、运用统计数据和方法,与偏好思辨的同时代美国社会学家有较大的不同。这并非偶然,杜波伊斯认为如果不能用尽可能科学的方法研究黑人问题,自己的声音不会被以白人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所接纳。在生前,尽管杜波伊斯赢得了韦伯的尊重,却未能改变其在美国社会学界遭漠视的情况。但从更大的历史跨度来看,这一策略发挥了作用。如穆勒(Muller, 2015)所说,如果他的方法不是领先时代,今天的学者恐怕也未必会花这么大功夫为其“平反”。这说明只有重视方法的发展,才能取得有长久贡献的学术成果。杜波伊斯预见到了美国民权运动的兴起,也意识到种族问题在美国社会的中心性。这些当然是重要的洞见,但若无一定科学的方法做支撑,就只能被归为个人的远见或历史之偶然,很难称为社会科学的成果。

杜波伊斯所同时重视的议题之本土化、方法之普适性具有内在的关联。议题设置反映的是学术共同体的趣味,是组织学术界注意力的机制,本身不可避免地包含价值判断。由于历史原因、社会条件,不同共同体存在趣味的差异非常正常,一时之间也很难使趣味趋向一致。但是方法的本质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开放性、普适性,如果方法不能传授、扩散,换一个学者研究就得到不同的结果,方法也就不成其为方法。要跨越不同共同体趣味差异的鸿沟、实现有建设性的沟通,双方都能理解的在一定条件下具备普适性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需要澄清的是,本文并不想用杜波伊斯的例子来证明统计方法有优越性。杜波

伊斯重视统计方法的运用，但与此同时其社会学研究行文风格颇为丰富，杂糅了论辩、诗歌、数据、祷文等各种各样的元素（Allan，2005）。渠敬东（2021）批评道，美国社会科学较为常见的中层模式“成为一种对于现实经验判断和文明历史构想无所关联的自我封闭的思维循环”。赵鼎新（2020）抱怨流行中层模式的西方社会学存在着微观机制解释与宏观结构理论严重脱节的倾向。谢宇（2018）认为，社会科学的定量方法有其局限，达不到物理学标准，因而也不应以物理学为榜样。三位研究取向迥异的学者都从不同角度批评目前流行于欧美的研究范式，值得深思。

由是观之，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应加强在方法上的努力，不能满足于做研究方法的学习者、搬运工，还要做研究方法的反思者、发明家。先进的方法不一定是最新的方法，而是在对方法深刻认知的前提下，为了解决特定条件下的理论问题而选择的更为合适的方法。如果不重视对方法的拓展，就只能追随国际学术界亦步亦趋，而不能量体裁衣，更好地研究中国问题。但与此同时，也应对方法特殊主义保持谨慎，仅在中国社会适用的方法未必是好的方法，能把中国社会研究透彻的方法对别国学者可能也有价值。譬如费孝通（2007）所探讨的传统中国“祖宗之法不可变”与应时权变的关系，为我们看待今天美国最高法院中坚持宪法原文的“原旨主义者”和“进步派”之间的对立提供了新视角。与此同时，尽管“中层模式”的研究有种种弊端，也不可否认，对其得当使用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仍有贡献。

此外，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不能回避当前以欧美为主的国际社会学格局，这一点与杜波伊斯面对以白人为主的美国社会学有微妙的相似之处。受杜波伊斯启发，中国社会学在很多议题上面对“双重脉络”的问题：中国社会学需要阅读相关英文文献，但却没有人期待欧美学者阅读相关中文文献。如果说理论驱动下的社会学研究终究要回归理论对话，中文写作的研究若难以被欧美社会学界阅读，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就无法影响欧美社会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随着主流研究脉络的发展，新的研究者必须不断处理两条脉络的复杂关系以及定位自己与主流和支流的关系。我们不难在很多文章的综述部分中看到这样的困境，中文研究被呈现为反应的而非主动的、事例而非道理、特殊的而非普遍的。如果在构成脉络主流的英文文献中某个理论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相关主题的中文研究总是不断返回此处。

杜波伊斯的经验对处理这样的“双重脉络”是否有所启发？回到杜波伊斯的历史语境，彼时欧洲为社会学的中心，美国则尚稚嫩。二战后美国社会学逐渐上升到了国际社会学的中心地位，而今天美国社会学者对杜波伊斯的重新发现，也就意味

着杜波伊斯被纳入国际社会学谱系的谱系。在这个意义上，既是杜波伊斯变得国际化了，也是国际社会学变得美国化了，其背后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因素除却美国社会学自身的举措，还有更宏大的全球社会经济变迁。杜波伊斯在世之时遭受学界排挤，似乎是失败了；百年之后有学者为其正名，一呼而百应，似乎又是成功了。他坚持本土化的议题、普适性的方法是关键。中国社会学或可借鉴，超越路线、门派之争，坚定地专注自身发展、为学术与社会创造价值，以待更大的历史跨度后迎来新的局面。

参考文献：

- 崔波，2013，《逻辑的相继性和共同性：布克·T·华盛顿和杜波伊斯观点之比较研究》，《思想战线》第S2期。
- 费孝通，2007，《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顾学稼，1990，《杜波伊斯与泛非主义运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侯波，1959，《毛主席接见杜波伊斯和斯特朗》，《人民日报》3月14日。
- 渠敬东，2021，《中国社会科学的人文性》，《开放时代》第1期。
- 舒漳，1994，《纪念杜波伊斯诞辰125周年暨中国杜波伊斯研究中心在京成立》，《西亚非洲》第1期。
- 王卓、王恩铭，2018，《既做美国人又做黑人——杜波伊斯民族主义和融合主义思想探析》，《世界民族》第3期。
- 谢宇，2018，《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新华社，1962a，《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接见和宴请杜波伊斯夫妇》，《人民日报》11月3日。
- 1962b，《毛主席刘主席和首都百万群众同外国朋友一起欢度国庆之夜》，《人民日报》10月2日。
- 张静静、谭惠娟，2014，《杜波伊斯的黑人女性观》，《求索》第5期。
- 张聚国，1999，《杜波伊斯的黑人“经济中国”与“自我隔离”思想》，《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2000a，《杜波伊斯与布克·华盛顿解决黑人问题方案比较》，《南开学报》第3期。
- 2000b，《杜波伊斯对解决美国黑人问题道路的探索》，《史学月刊》第4期。
- 2001，《杜波伊斯与泛非运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赵鼎新，2020，《论机制解释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及其局限》，《社会学研究》第2期。
- 郑小簫，1959a，《周总理接见杜波伊斯博士》，《人民日报》2月23日。
- 1959b，《宋庆龄副委员长接见杜波伊斯》，《人民日报》4月21日。
- 1959c，《首都人士举杯为杜波伊斯祝寿》，《人民日报》2月24日。
- 周飞舟，2021，《将心比心：论中国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 Allan, K. 2005, *Explorations in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Seeing the Social World*, California: Pine Forge Press.
- Bulmer, M. 2017, "W. E. B. Du Bois and Robert Park."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8 (1).

- Burawoy, M. 2021, "Decolonizing Sociology: The Significance of W. E. B. Du Bois." *Critical Sociology* 47 (4-5).
- Camic, C. & Y. Xie 1994, "The Statistical Turn i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1890 to 1915"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 (5).
- Carson, C. 2016, "The Triumph of W. E. B. Du Bois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Pioneer." *Journal of Civil and Human Rights* 2 (2).
- Connell, R. 2013, "Understanding Empire." In George Steinmetz (ed.) *Sociology and Empire: The Imperial Entanglements of a Disciplin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Deegan, M. J. 2006, "The Human Drama Behind the Study of People as Potato Bugs."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6 (1).
- Du Bois, W. E. B. 1899, *The Philadelphia Negro: A Social Study and History of Pennsylvania's Black American Population; Their Education, Environment and Work*.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1903,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Chicago: A. C. McClurg and Company.
- Gao, Y. 2013, "W. E. B. and Shirley Graham Du Bois In Maoist China." *Du Bois Review: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Race* 10 (1).
- Go, J. 2016a,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Social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6b, "The Case For Scholarly Reparation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60.
- Goldberg, C. A. 2012, "Robert Park's Marginal Man: the Career of a Concept in American Sociology." *Laboratorium* 4 (2).
- Hunter, M. A. 2017, "Review: The Scholar Denied." *Sociological Forum* 32 (2).
- Jones, N. 2015, "Debating Du Bois – Aldon D. Morris, the Scholar Denied: W. E. B. Du Boi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ociology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6 (3).
- Kurasawa, F. 2013, "The Durkheimian School and Colonialism: Exploring the Constitutive Paradox" In G. Steinmetz (ed.) *Sociology and Empire: The Imperial Entanglements of a Disciplin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Lentin, A. 2017, "Book Review: Aldon Morris, the Scholar Denied: W. E. B. Du Boi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ociology." *Sociology* 51 (1).
- Matthews, F. 1977, *Quest for an American Sociology: Robert E. Park and the Chicago School*.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Morris, A. 2015, *The Scholar Denied: W. E. B. Du Boi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ociolog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16, "Response." *Journal of Civil and Human Rights* 2 (2).
- 2017, "The Quest to Overcome Irrelevance in a Troubled World: Can Du Boisian Analyses Rescue Sociolog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8 (1).
- 2022, "Alternative View of Modernity: The Subaltern Speak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7 (1).
- Muller, C. 2015, "Politics and Science in the Work of W. E. B. Du Bois-Aldon D. Morris, the Scholar Denied:

- W. E. B. Du Boi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ociology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6 (3).
- Myrdal, G. 1944,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 Park, R. E. 1928,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3 (6).
- 1950, *Race and Culture*. Glencoe: Free Press.
- Park, R. E. & E. W. Burgess 1921,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abaka, R. 2020, “W. E. B. Du Bois: From Pioneering Pan-Negroism to Revolutionary Pan-Africanism.” In R. Rabaka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Pan-Africanism*, London: Routledge.
- 2021, *Du Boi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ark: Polity Press.
- Scaff, L. 2011, *Max Weber in America*.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homas, W. I. & F. Znaniecki 1984,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Weber, M. 1971, “Max Weber on Race and Society” *Social Research* 38 (1).
- 1973, “Max Weber, Dr. Alfred Ploetz and W. E. B. Du Bois (Max Weber on Race and Society II)” *Sociological
Analysis* 34 (4).
- Wienen, M. V. & J. Kraft 2007, “How the Socialism of W. E. B. Du Bois Still Matters: Black Socialism in ‘the Quest of
the Silver Fleece’ and Beyond.”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41 (1).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罗 婧